

66

沈阳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4 - 3

目 录

- “誓做中华之主人”何履复 (1)
- 回忆杜重远同志卢广绩 (7)
- 解放战争期间沈阳学生运动
- (地下学联) 概况张 超 (21)
- 新发现的一份郭松龄反奉期间的军事
行动记录薛景平 (44)
- 关于郭松龄夫妇被捕被杀害的时间与
地点问题薛景平 (51)
- 郭松龄将军选送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学生的情况李英夫 (59)
- 男同泽中学的变迁安泉溥 张玉璇 张凤翮 (72)
- 我所知道的穆春彭静山 (79)
-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目击记温守善 (85)
- 杨常事件目击记张汝舟 田 璇 (90)
- 傅作义的东北来去李英夫 (101)
- 沈阳的七寺四塔及其它关 方 (105)
- 旧沈阳的“杂巴地”西 园 (137)
- 第一商场(兴游园)忆游仰岳岱 (145)

“誓做中华之主人”

——记周恩来同志少年时期，在沈阳南郊魏家楼子村度暑假，与私塾老先生何殿甲学诗对对对生活片断

何 履 复

写在前边的话

我是苏家屯区沙河铺乡魏家楼子村人，现任沈阳市新城子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我的四伯父何天章与三堂兄何履禎都是周恩来同志少年时期，在奉天城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的同学，读书时都在学校住宿。从一九一一年暑假起到一九一三年夏，几个暑假，周恩来同志都是与两位同学到魏家楼子度过的。那时伯祖父何殿甲正在村内小学堂教书。三堂兄何履禎之父早亡，由其祖父何殿甲抚养。为此，周恩来同志几次到魏家楼子都与伯祖父住在一起。通过接触，何殿甲看到周恩来同志勤奋好学，才华出众，认为是他执教一生中迁到的最好的一个学生。伯祖父的诗文集手稿，我们已经珍藏了三代。其中一部份诗文概括地记录了周恩来同志少年时期在魏家楼子度假生活的情况，也反映了周恩来同志少年时期的远大胸怀。

感时勿落泪，誓叫寇惊心

一九一一年夏，周恩来跟他的同学何天章、何履祯到魏家楼子度暑假，住在伯祖父何殿甲家里。伯祖父带领他们三人游览了村东的烟龙山。

烟龙山一带是日俄战争时的战场。战后六年，魏家楼子村仍留有战争的残垣断壁；村外的战壕、炮垒遗迹尚存。

伯祖父何殿甲在烟龙山上，讲述了我家在日俄战争中死亡四人重伤四人、曾祖父何朝云被活埋了的遭遇，也讲述了当时日俄都想吞并我东三省的史实。伯祖父沉痛地说，日俄两国为了抢夺东北而开战，腐败的清政府既不抵抗，还宣布中立，划辽河以东为战场，让日俄在这里打仗，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伯祖父当即写了《登东山歌》一首，寄希望于周恩来。歌词是：

登彼龙山兮山巅，望彼河水兮潺湲。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泪纷纷兮余怀，恨悠悠兮苍天。英雄竟起兮列山川，不知何日兮奏凯旋。慨三省民兮涂炭，溯历代兮皆然。吾已生于斯兮长于斯，恨不能翱翔兮五湖烟。今吾老兮有何志愿，图志强兮在尔少年。

伯祖父的诗句，激起了三位少年的爱国热情。他们曾议论说：“清朝廷腐败无能，将来我们自己干，非把列强从中国赶出去不可，不能让他们随意蹂躏我们的国家。”

在伯祖父的家里，周恩来同志看到何殿甲的书房里挂个条幅，抄录的是杜甫的一首《春望》诗。上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还看到伯祖父含着泪花颂读这首爱国诗句，即在伯祖父的书房里拟《春望》改写了一首《村望》诗。其诗句是：

国破山河在，村残草木深。

感时勿落泪，誓叫寇惊心！

烽火连岁月，捷书抵万金。

白头休志短，患除贺更新。

伯祖父看后十分惊愕，感叹不已，喜他朴实敦厚，才华出众，有理想，有抱负。

日俄战争结束后，走了俄大鼻子，来了日本鬼子。伯祖父面对清末的历史现实，忧国忧民的情感不断涌起，经常默默地吟咏抒发感情的诗歌。

一天，周恩来听到我伯祖父悲伤地诵读陆游的《示儿》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周恩来颇有感触地遂即按陆游《示儿》诗的原韵拟写了一首抒发自己内心激情的诗：

战火洗劫万室空，吾侪争见九州同。

华师尽扫列强日，捷书飞传告鳌翁。

爷爷字鳌峰，听他这么一改，深受鼓舞，对年少的周恩来更加热爱了。

周恩来同志每次来度假，伯祖父总与他研究诗文，谈古论今。一天，伯祖父说：“恩来，你的文字不错，我出一上联你对下联如何？”周恩来说：“可以。”伯祖父示出上联说：“勿当列强之奴仆。”周恩来说：“誓做中华之主人。”伯祖父一看对得十分得体，非常赞许，连连点头说：“对得好，对得好。”

问政、问道、问教

一九一二年夏，周恩来随同学到魏家楼子度暑假，仍住在伯祖父家里。他对国家前途、国际时事、教学之道非常关心。为探讨问题，经常与伯祖父谈到深夜。

一次，周恩来与伯祖父谈论国家形势，周恩来问到：“我们的国家和命运将怎样？”伯祖父就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回答，并把这些内容概括成《闲吟》诗一首说：

时势问如何？艰难日日多。
党人分数派，民国失中和。
总理愁无策，英雄全无谋。
天心原有定，只以德与科。

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宣扬所谓《奉天会战第四军战绩》，在魏家楼子村东烟龙山立一块碑。沙俄在魏家楼子后山也立了一块石碑，纪念他们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其碑文大意是：“献给为保卫沙皇而死难的烈士”，“世界上最高的爱情，在于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一天，周恩来同志观看了石碑之后，问我伯祖父：“日俄两国打仗，为什么在中国打呢？”“他们打完仗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立碑作纪念呢？”伯祖父把回答的问题写成《悲胡歌》十六韵：

崔嵬复崔嵬，两国列战垒。貉胡大点兵，倭奴运粮台。为一生死战，不顾性命摧。一处东夷地，一居北冰崖。因何大交兵，都至东土来？吾华地肥美，因洽彼心怀。死士爷娘生，呜呼命哀哉。白骨堆满山，精魂何日回。十年方埋葬，骸骨没尘埃。不过拢兵心，免得再战灰。勒碑兼刻铭，国王巧安排。扬言葬忠魂，

国家大典推。仅可赚痴人，智士莫须猜。自古而至今，胡地战场开。吾已生于斯，破产与遭灾。人与畜牲居，恶不异狼豺。

周恩来与我伯祖父接触多了，感到老先生学识很渊博，十分敬仰。一次，周恩来不解地问：“有人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你这么高的学问，怎么不出去做点事呢？为什么甘愿教一辈子书呢？”还问：“什么样的老师才能算好老师呢？”伯祖父跟周恩来谈了自己的心声，并就此，写了《自戒》诗一首，以兹牢记。其内容是：

教员责任莫言轻，理路科门要讲明，
百两薪金群庶血，先求不负少年生。
为师首重训蒙童，如乳初含到口中，
倘若字白兼讲误，问心难免愧苍穹。

撰赠诗文寄深情

一九一三年夏天，周恩来与其同学，从奉天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毕业，就要到天津升学深造去了。伯祖父得到这一信息后，立即赶到奉天城，叫何天章、何履楨把周恩来请到小河沿，为其饯行。由于当时无钱资助，只能提笔写些诗文，道道离情，谈谈希望。当时伯祖父写了《赠周恩来南归诗》五首和《赠周恩来文》一篇，做为临别纪念。其具体内容是：

赠周恩来南归诗

辽东江北路迢遥，两地结成义气交，
沈水饯别同洒泪，邮传书信莫迟捎。

同校同班又同盟，以文会友话三更，

焦桐^①入听谁知己，除却周生即吕生。

君欲南旋怅别离，不知后会在何期？
倘能共到凌烟阁^②，自有言欢聚首时。

读书只在性情坚，莫学浮夸那少年，
今日南归无物赠，略将诗句作金钱。

人生海角与天涯，好似飞鸿印泥沙，
俟尔南归由塞北，飘萍无定宦^③为家。

赠周恩来文

能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才；有非常之才，始成非常之业。彼季子刺骨，后为六国相；司马题桥，终能乘高车；班超投笔，果封万户侯；张良坚忍，卒成汉世业。如四君者，岂不藁然大丈夫哉。

自古及今，英雄豪杰，不大困者不大亨，能冒险者方出险，此定理也。况吾人读书，虽不敢言囊称饶裕，亦不如家索清贫。衣食有资，修金不用，正男子有为之日，学生造诣之时。较诸挂角读书，牧豕听经，凿壁偷光，映雪读书，当何如也。

义孙周生与小孙有朋友之义，同堂为学，南北距五千里之遥，开班萃一堂之上。善则相劝，过则相规，交非浮泛，谊切同胞。今值南旋，洒泪相别，后会之期，在何时也。

吾无黄金万镒，朱提千镮，馈贶周生，仅具片语，以作纪念云尔。

编者注：注^① 焦桐：指蔡邕的焦尾琴，琴音甚美。此句比喻为曲子高雅，能唱合的人少，所以知音难得。注^② 凌烟阁：唐太宗把建国功臣的像画下来放置在凌烟阁上。所以后人把凌烟阁比喻为建国功臣。注^③ 宦：游学也。

回忆杜重远同志

卢广绩

一九四三年秋，杜重远同志因为抗日救国，被新疆的反动军阀盛世才惨杀在新疆监狱中。四十年来，做为和重远长期在一起工作、一起奋斗的战友和同志，他的音容笑貌，永远使我不能忘怀。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他的光辉业绩，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

一八九七年，杜重远同志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一九一一年，重远同志十五岁时来到沈阳读书。辛亥革命后，我们先后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重远在附属中学第二班，我入初级师范本科第十班。当时我们的同学还有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孙恩元、赵毅等。学生时代的重远同志，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进取心很强，富有爱国热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日英同盟的关系，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同时，派兵占领了原德国侵占的中国领土青岛和胶州湾。并乘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实际上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袁急于称帝，为取得日本帝国



照 片 说 明

这是杜重远同志一九三〇年在沈阳和奉天两级师范同学的合影

前排左起卢广绩、王卓然、孙恩元。

后排左起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

合影时，卢广绩任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

王卓然任东北大学教授。

孙恩元任海城同泽中学校长。

阎宝航任奉天青年会总干事。

杜重远任奉天长官公署外交秘书。

王化一任辽宁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主义的支持，竟然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日本谈判，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订立了所谓“民四条约及换文”，基本上接受了二十一条。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当时我们两级师范学校的学生，虽然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不能参加社会上的反袁斗争，但在校内，却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我们写墙报，组织集会，抗议反动政府出卖国家主权，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重远同志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记得他当时做宣传鼓动工作，他的讲演坚强有力，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使同学们听了深受教育。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彼此相识并开始接触的。

重远毕业后，在沈阳当了一段小学教师。不久，考入留班。一九一八年，以官费留学到日本，入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学习。

他留学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特别在我们东北，不断的制造各种借口，进行挑衅。如延长联结官会铁路问题，南北满铁路并行线问题，临江设领和郑家屯交涉等问题。惨杀中国人民的事件屡见不鲜，激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极大愤怒。特别是东北籍的留日学生，慨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组织了宣讲团，回到东北向各级政府呼吁，向各界人民进行宣传，号召人民起来同日本侵略者做不屈不挠的斗争。重远同志参加了这个宣讲团，到东北各地进行宣传。这对唤起人民，特别是大中学校学生掀起反抗日本侵略、保卫祖国，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一九二三年冬，重远同志学成归国，在当时以留日学生头衔，想当官是很容易的。但他感于我国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落后，屡遭外国侵略的情况，决心不做官，投身实业，振兴中华。鉴于

沈阳当时尚没有机器制陶工业，乃创建了一个机制陶厂，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肇新窑业公司”，于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正式投产。东北之有机器制陶工业，重远同志实为首创者。

当时重远以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青年，既无祖业可以继承，又没有社会渊源，要筹集资金创办实业，困难是很多的。他依靠旧日老师和朋友们的支助，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才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八年，年轻的张学良将军任东北边防长官。他很想有一番做为，励精图治，积极兴办实业和教育，以求富国强兵。所以，重远创办实业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张学良曾到“肇新窑业公司”参观，并投资十二万元，还同意免纳营业税五年，以和日本陶瓷业抗衡。重远创办的实业，得到扩大和发展。

在此期间，重远同志被推为奉天省总商会的副会长。他任会长期间，敢于录用一些进步人士参加商会工作。高崇民同志就是这时到商会任总务长的，使得商会工作颇有建树和成效。当时，沈阳市工商界也有了新气象。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奉天省长翟文选事先没有和商会协商，即令商民附加警捐。这是一项额外负担，引起商界的强烈不满。重远同志认为政府不顾商民疾苦，随意摊派捐税极不合理。他同情、支持商民的反对意见。并和高崇民一起，发动奉天几万商人罢市，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重远同志走在商民前面，要求政府收回成命。这使奉天当局惊慌失措，极为震动。认为杜重远要领导商民造反，并夸大其辞，上报到司令长官公署，引起张学良对杜、高二人的不满，遂命令解除二人的职务。这样一来，重远同志在沈阳市工商界人士中，得到了更大的同情和支持，声望更高。直到今天，有些老年商工界人士谈起当年的事情，还对重远

同志称赞不止。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坚持正义，敢于斗争，是年轻时代重远同志的突出特点。

重远同志被解职后，张学良将军委派我暂行代理商会会长职务。我向张表示，以我和重远的关系而言，不好接受这一工作。张告诉我，放心到职上任，至于杜、高二人的工作，他自有妥善安排。我到职后，工作生疏，许多事情都得到了重远同志的帮助和指导。

由于重远同志深孚众望，张学良将军也认识到他是一位热爱祖国之有才之士，仍深加器重。解职不久，即委以司令长官公署的外交（日文）秘书。特别是涉及对日外交活动，都有重远同志参加襄助。对他经营的企业，也给予更大的支持。杜、张二人的交谊益深。这同时，高崇民同志被委以省农会会长。

重远同志任奉天总商会付会长时期，正值我任奉复印版石矿公司经理。这是一家加工制造国产印刷石和大理石的公司，工厂设沈阳，矿山在复县。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奠都南京不久，孔祥熙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为了点缀新政，拟在上海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孔曾给张学良将军拍来电报，希望奉天省能参加这个展览会。张命令重远同志负责筹备。因为我是国货厂商，遂被邀请参加筹备工作。并被推派为奉天总商会代表赴上海参加这个展览会，因此得以经常同重远一起商量和研究问题。他处理问题精明爽快，严肃认真的精神，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到上海除参加“中华国货展览会”，还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会联合会。那时奉天同南京虽然有些往来，但还没有易帜，仍处于半独立状态，情况很复杂。而我年纪又轻，处世经验不足。所以，我在上海三个

月期间，经常同重远同志函电往来，对我各方面的工作，他都给予具体及时的指示。我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是和重远同志以公私关系，随时给予指示和帮助分不开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我和重远同志都是出席这次会议的辽宁代表。会后代表们分别到各地游览参观。我同重远单独由杭州去莫干山，又一同到无锡游览惠山和太湖。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起在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下处境万分危急的东北父老，又联想到张学良将军虽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有一定认识，也有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愿望。但情况那样复杂，他又年纪轻轻，初掌军政，难于应付这一发千钧，朝不保夕的危难局面。想到这些，便觉意趣索然、游兴顿减。怎能对张学良将军有些帮助，挽救这危险的局面呢？真是忧心忡忡。

回想一九二九年我们成立的“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不久，便在东北各省、市、县都建立起分会，今后怎样才能更好的领导和运用这个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这个问题，我们两人交换了意见，都认识到必须健全这个组织的领导核心，使领导人坚强起来。后来我们又同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等同志相商，他们都同意我们的主张。就是说，我们应该加强组织，积极行动起来，肩负起挽救东北危亡的任务。回想起重远同志每谈到这些问题，总是那样激动，那样坚强，充分表现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

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立即搜捕

重远同志，所幸重远同志当时不在沈阳，才免于罹难。后来，重远同志乔装逃到北平，而我已先期到达。我们在一起促膝交谈，共同感觉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张学良屈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把几十万东北军撤往关内，把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侵略者，三千万家乡父老任日寇蹂躏杀戮。在这大敌当前、乡土沦陷的危亡之际，我们再也不能默不作声了。不久，我们和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老同志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加强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指导和声援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重远同志对这个抗日救国组织抱有极大的信心。并受救国会的委派住在上海，同京、沪各地同情和支持抗日救国的各界爱国人士紧密联系，以加强救国会的工作。

不久，爆发了“一·二八”淞沪的抗日战争。当时，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也更加鼓舞了在东北各地活动的抗日义勇军。这时期重远同志同上海工商界，文化界人士来往频繁，同邹韬奋、沈钧儒、胡愈之等同志，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韬奋同志在为重远所著《狱中杂感》一书序文中写到：“我把杜先生视为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特别是当时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潘汉年在周恩来同志指示下，与重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我就曾在重远家中和潘汉年同志相见过。这使重远同志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时，重远同志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也建立了经常的联系。

一九三二年冬，长城抗战的序幕揭开了。在北京成立了“东北热河后援协会”，由朱子桥将军领导。各界人士积极支持后援会的工作，表示一定要保卫热河。记得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和上海救国会代表黄炎培等都曾来到北京，和张学良将军

一同去热河部署一切。重远同志也随同前来，做战地宣传工作。同时他还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宣传工作。由于国民党政府没有抗日的决心，防御力量不足，为时不久，热河即为日军攻占，战争已逼近长城各口。接着签定了“何梅协定”和“唐沽协定”使华北局势发生突变。后援会的工作也被迫结束。

不久，张学良将军被迫交出军权，出国考察。重远同志这时在上海积极参加各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还经常为当时销售最多、深为广大读者欢迎的《生活周刊》撰写文章，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对外、抗日救国。许多青年阅读这些文章，受到鼓舞和启发，激发了爱国热情，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事业中。

一九三三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更加疯狂，而国民党政府也加紧了投敌卖国活动，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爱国人士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被迫停刊。这时重远同志挺身而出，创办了《新生周刊》。他在发刊词中写到：“本刊不顾艰困，不辞劳瘁，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努力，以求实现中国民族的新生”。

他还亲自撰写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颇受广大读者欢迎。

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于《新生周刊》刊登《闲话皇帝》一文，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抗议。说这是对日本天皇的污辱，是对天皇的大不敬。并要国民党当局严惩《新生周刊》的发行人。上海国民党政府竟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完全照办。勒令《新生周刊》停刊。并将重远同志逮捕，判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押入上海曹河泾监狱。重远同志在法庭上愤怒质问：“爱国何罪？”“中国法律何在？”听众席上的群众对法院的无

理判决，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

对重远同志的无理判决，也引起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震动，纷纷抗议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并由重远同志的好友高崇民等提出上诉，竟被国民党当局搁置不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从国外回到上海，知重远已被移到苏州监狱，当即会同崇民同志前往看望。当时他的身体虽然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十分坚定。谈到国内局势时，也很乐观。对我的工作，给予热情鼓励。对我想离开抗日救国岗位，去经营中美贸易，筹措救国基金的消极想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使我深刻感到重远对同志、对朋友的真挚情谊，至今虽已相隔四十余年，始终不能忘怀。

记得重远同志被捕后，我曾经向张学良将军表示，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关系，使重远同志早日获释。张当即表示不能这样做。并说：“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看到杜重远因为抗日救国而坐牢，这是他的光荣。”

一九三六年春，张学良将军到南京开会。这时重远同志已因病由监狱迁到上海虹桥疗养院休养。张利用这个机会，亲自到疗养院看望重远同志。重远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力劝张学良将军不能再继续执行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了，必须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中国才有出路。张听了为之动颜。这个阶段，重远同志也一再向我表示：绝不能把挽救中国危亡和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当时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如宋子文等，曾用高官厚禄来拉拢重远同志，希望他为国民党效劳，均为重远同志所拒绝。